



# 战地黄花分外香(二)

周口太康籍革命作家、战地记者曾克的故事



曾克

核心阅读:

1935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,1938年出版报告文学《在汤阴火线》,获得茅盾等人的好评。1940年冬,在周恩来关心帮助下,奔赴延安。1942年,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,有幸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,参加小规模的介绍与合影。1947年,作为随军记者,参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,写下《挺进大别山》等战地名篇。1949年,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、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,参加开国大典,并用相机记录那一伟大时刻。1978年后,担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。我们叹服她的革命经历,折服于她的雄文大作。她的身世更让我们倍感亲切——她是周口人,她出生在千年古县太康。在历史悠长、文脉悠长的周口,在众多周口文化人物中,曾克无疑是高举大旗走在前列的。有点遗憾的是,许多周口人至今并不知道曾克,不知道她还是“著名”的周口老乡。

□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

“饥饿干渴”的童年

1917年,曾克出生于周口市太康县。太爷爷、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,中过秀才,以私塾教学为业。1919年,她的父亲曾亮考人国立高等师范学堂(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)。曾克的长辈多是学有所成的读书人,家庭书香缕缕,她的童年生活应该无忧无虑吧?其实不然。她曾回忆说,她的童年是饥饿的。

在她出生时,曾家已从书香世家沦为为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曾亮长年在外谋生,一家人缺少经济来源,缺吃少穿。父亲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,虽然没有给女儿提供较好的生活,却为女儿解除了封建枷锁——不准家人给女儿缠足、穿耳、说婆家。

5岁时,曾克进入母亲武翠莲创办的私立小学读书。曾克从小就爱书,家里有一本母亲用来教识字课本,被翻得破烂不堪。曾克印象最深的是书上有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几个字,这或许是她最早的启蒙读物。家里还有一本厚书——祖母、母亲和自己都读不懂的《圣经》。幼小的曾克收拾碎头发换糖人,捡麦穗换几个铜钱。她把这些存到礼拜天或圣诞节,拿出来捐给外国传教士,得到几张圣经故事画片。不过,曾克并不喜欢,也看不懂这些。曾克回忆说:“生活和我那幼稚的灵魂仍是饥饿的、干渴的。”

1926年,父亲曾亮在开封找到工作。这年春天,9岁的曾克随父母、祖母和两个妹妹,坐着独轮车离开太康县城,带着豫东平原的贫困和乡土气息,前往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。

文学之路在此起步

从1926年到1936年,曾克在开封生活了整整十年。这里给她留下最清晰、最深厚、最宝贵的记忆。她的文学之路在此起步,革命征程也从这里扬帆。

相较于童年灵魂上的饥渴,来到开封后,曾克对知识的汲取达到“狼吞虎咽”的地步。父亲曾亮在开封著名的北仓女子中学(今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前身)担任史地教师。父亲是个“书呆子”,爱书如命,家里有整套的《万有文库》《国学丛书》,有《东方杂志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,父亲的卧室兼书房里,满桌、满床都是书,只差没有把他埋起来。

当时曾克一家六口人,她和妹妹上学,吃饭穿衣,看病等都靠父亲微薄的薪水。可是,父亲几乎把每个月一半的薪水用来买书。家里经常米净面空,缺盐少柴。一家人终日为了养家糊口而挣扎。奶奶和母亲流着泪埋怨父亲,父亲只是淡淡地说:“喝几天面糊没意见。”

在这样窘迫的日子里,曾克却找到快乐。她常常溜进父亲的书房,从小山似的书堆里,找到自己的心爱。从此,她开始接触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。书,像带有吸盘一样,紧紧吸住了曾克那年少的心。有的书是文言文,她并不能全懂,可其中形象细致的描写,生动的情节,特别是女主人公们的不幸命运,仍让她如痴如醉,常常为书中人物流泪。她看到了人间的不平,心灵深处埋下爱恨与善恶的种子。

点燃心中爱国火花

开封十年,曾克在北仓女子小学、中学学习生活9年,读完高小读高中。北仓女子中学是河南创办最早的女子中学,也是河南省最早的革命摇篮。该校创办人和历任老师绝大多数是爱国民主人士,又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教育家,如冯友兰、稽文甫、楚图南、谢瑞阶、曾次亮等。曾克回忆说:“北仓中学是一个地火的储备库,是培养革命力量的大课堂。”从1925年起,就有共产党员在校任教。1933年到1937年间,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相继不断,直接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,领导学生参加抗日爱国运动。

革命的“地火”不断燃烧。年少的曾克敏锐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力量。有段时间,她发现父亲的口袋里装着欢迎北伐军的小旗、传单,父亲的谈话声爽朗起来,仿佛升起希望之光。

大革命失败后,父亲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家里,深长地喘息,有时捶胸顿足,像是要掀掉身上的大石板一样。全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神经病。有点反常的是,他不再买书了,可是拿回家的钱并不比过去多。有一天,一个同班的大姐姐把曾克堵在厕所里,悄悄地说:“小曾,我看你爹就是革命党,要不,他能给往外跑的学生拿路费?”

曾克明白了,几个月来父亲“薪水减少”的谜团解开了。曾克回到家宽慰

奶奶和母亲:“爸爸没拿回的薪水是接济了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啦。”

几十年后,一家人才知道真相——1926年9月,曾亮亮拿工资,资助学生危拱之等赴武汉投考革命军校。危拱之后来成了河南妇女革命的先驱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怒潮,也点燃了曾克心中的“星星火花”。1934年春天,曾克开始接触俄国十月革命事迹,阅读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蔡和森的《社会进化史》以及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。听闻老师讲述普罗米修斯盗火牺牲的故事后,她心中迸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、卖国贼的仇恨。她和四位同学在笔记本上、小纸片上书写绘画,悄悄地贴在学校黑板报内,抒发自己的爱和恨。

创办壁报 卧轨请愿

有一段时间,曾克等人常在夜深人静时爬起来,躲在厕所里,利用两个蹲坑中间那盏微弱的小油灯写画。后来,她们不约而同在学校后院煤仓里聚会。五人约定,要以一己之力,成为“人间光明之火种”。

五人将壁报的名字定为《五只手》,在报头还幼稚地画上五只手,每只手举一个武器:镰刀、斧头、刀、剑和笔。煤仓就成了她们的编辑部。多少个午夜三更,小油灯伴着她们,直到黎明。趁着启明星升起,《五只手》被贴在图书馆门前槐树下的壁报栏内。它存在的时间有时仅像流星那么一闪,但它总是要点燃星星火花的。

《五只手》成为曾克较早发表革命文艺作品的阵地,散发着抗争的气息、青春的热血。

1935年12月,为响应北平“一二·九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,曾克参加开封的大中学生罢课、请愿运动。她走上街头发表演说,编印传单,办壁报,写宣传诗,高呼“华北危急!中国危急!”她参加卧轨请愿,坚持四天四夜,致使火车中断一百多个小时。曾克的父母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,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。

在开封街头,曾克主演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她完全沉浸在角色中,对侵略者的仇恨、对时局的无奈,多种情绪瞬间迸发了。演至动情处,她擦着眼泪,扑向用皮鞭抽打她的老人怀中。她的动情演绎点燃了现场的气氛,观众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声浪如雷,此起彼伏,演出不得不暂时停止。多年后,曾克的妹妹回忆说,看到姐姐等人的演出,一颗火种在心中埋下,自己仿佛一下子长大了。

此时的开封铁塔、龙亭等,在曾克眼中已不再是名胜古迹,而变成了她和同学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接头、聚会、隐蔽掩护场所。她们有时故意泛舟人少的潘家湖,有时爬上高达十三层的铁塔顶去座谈,有时到鼓楼下看杀“土匪”,有时还去龙亭后面悄悄为收敛烈士遗体的亲属流泪。

1936年早春,曾克因为参加卧轨运动及其他抗日救亡运动,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。曾克不得不离开开封。在老师的引荐下,她只身一人来到上海,在一家幼儿园做保教员。

曾克后来说,在开封十年期间,她对社会、历史、阶级斗争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,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献身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。

以笔为枪 初上前线

1936年,曾克来到上海。虽说是为了避难谋生,她的爱国激情却持续高涨。她参加了一个青年进步社团,第一次听到著名学者艾思奇讲解《大众哲学》。曾克还读到《西行漫记》一书,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认识。1936年10月,鲁迅先生逝世。曾克宁愿被扣发工资,也毅然加入到为鲁迅先生送葬的队伍中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抗战爆发后,曾克从上海回到开封,将一年多来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而燃起的抗日大火带回河南。她在河南大学借读,投身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,参加学生演剧队,创办救亡刊物。

在地下党介绍下,曾克进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,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。年仅20岁的曾克,穿梭在连天的炮火中,勇敢年轻的身影为残酷的战场增添一丝光亮。

在安阳汤阴火线,曾克住在没有

逃走的老百姓家里。她把自己并不充裕的食物分给李老太太,又警觉地发现老太太的儿子是汉奸密探,随即把他绳之以法。

在春节前一天,她看到全村妇女倾其所有也要让战士们吃一碗饺子。当全村人把饺子送到前线阵地时,炮火袭来,一位十七八岁的战士中弹倒地,口袋里露出一个被咬了一口的饺子。

她和几个同事化装来到日军占领的安阳城,侦察敌情,设计除死了一个日军军官。

几个月后,曾克离开战场,来到武汉。她把这段战火中的经历写成《在汤阴火线》。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,著名作家茅盾以笔名“玄”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。

不久,曾克又创作了一部七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《在战斗中》。这部纪实作品是她跟随部队辗转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,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、普通民众,还有乡镇、矿山,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。

著名作家高长虹在评价曾克的《在战斗中》等作品时,称作者是“少年作家”中最“少”的一个。他说:“我看到这些作品,觉得很惊奇,出乎意料地,这沙漠中的绿洲,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。”

《在汤阴火线》是曾克的报告文学处女作,出版后得到茅盾、高长虹等人的大力支持,并亲自著文推介,对宣传全民族抗战、反对投降产生了好的影响。

曾克初出茅庐便以笔为枪,真实记录了抵御外敌的苦难与辉煌,作品承载着民族的红色记忆。

周恩来帮助去延安

1939年,曾克来到重庆,一度找不到工作,一些进步书刊被查封,她的作品无处发表,终日“贫困交加,濒临在死亡线上”。

1940年开春,在各方友人的帮助下,曾克在一家私立学校担任老师和管理员。当时,曾克连一套简单的被褥都没有。著名作家老舍特意送来一床半旧的俄国毛毯。曾克执意不收,老舍生气了,眼圈发红,一句话也没有说,把毛毯留在椅子上就走了。

刚刚有了工作,一个学期没过完,日寇飞机轰炸重庆,曾克任教的学校落下炸弹,宿舍被炸塌。毛毯被埋入瓦砾中,半个月后才被扒出。学校无法上课,曾克又失业了。

茫然无助之际,曾克从不同渠道听说周恩来时刻都在关心进步青年和文艺工作者,了解和熟悉很多人的生活和政治情况,帮助愿意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去的人。

曾克非常向往延安,但是仅仅通过抗日救亡组织负责同志的介绍,周恩来并不认识她,去延安的愿望能实现吗?曾克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

9月的一天傍晚,她刚刚赶回借住的小屋,吹熄小油灯,忽然响起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的几下敲门声,她立即开门。悄悄进来的正是那位救亡组织的负责人,他没有等曾克说话,便故意高声大嗓地说:“医院通知你有床位了,现在你要马上去。”

曾克明白了他的话意,一言未发,立即出了门。一路上两人相距很远,各走各的,似不相识。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那人告诉曾克:“你已经被国民党的特务鹰犬盯上了,周副主席要我负责帮助你即刻甩掉尾巴。他从敌人文化特务的黑名单上发现了你的名字!”

曾克惊呆了。这不是慑于敌人的迫害,也不是庆幸自己的脱险,而是因为一个贫病交加、饥寒交迫、步入险境的孩子,突然扑进了“母亲”——党的温暖怀抱。她实在没有想到周恩来能够这样细心地关怀她这个并未见过的青年!

两天后,曾克得到了启程的通知。临行之前,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,她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。周恩来对我说:“我看好你太瘦了!肯定是吃不饱饭吧!不要紧,到延安去,咱们边区的小米一定能把你吃胖的。”曾克的眼泪夺眶而出!

接着,周恩来不惜花费相当长的时间,对曾克谆谆教导:一个革命青年,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出的道路,和工农相结合,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文艺工作者,一定要长期参加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,要像鲁迅那样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这些珍贵的教导奠定了曾克革命思想的根基,让她牢记终生。

奔向“母亲”的怀抱

延安,中国革命的圣地。抗战时期,那里为无数热血青年向往。从重庆到延安,要穿过国民党几千公里的封锁线,当时,曾克已怀有身孕,困难可想而知。

曾克一出发,就患上恶性菌痢,险些流产,生命一度垂危。延安如同一座灯塔,给了她坚持的力量。路上,她又接受组织安排,带着两个来自泰国的青年华侨一同前往。

曾克一行通过关系坐上一辆国民党发往大西北的货车。司机名为到西北运送苏联援华抗战轮胎,实为走私发国难财。汽车在宝成公路上老牛似地爬行两个月。一路上,司机天天想法敲竹杠要钱,稍有不满,就故意以抛锚野外或送检查站相威胁。一行人随身带的值钱的东西,慢慢都变卖了。两个华侨最后把包在牙上的金牙套也变卖了。一路上千难万险,没有动摇曾克等人的信念。他们相互鼓励:“我们是朝圣者,不到延安誓不罢休!”

12月中旬,曾克一行终于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。即便来到这里,仍有危险。办事处的领导再三叮嘱安排,出门买东西就可能被国民党抓进集中营,门口的小贩不少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。

稍作停留,曾克又乘上八路军的军车行驶在黄土高原。终于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到达延安,投入期盼已久的“母亲”的怀抱。

感受“母亲”的温暖

一路上延安的黄土,曾克就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、母亲般的温暖。

刚到延安的一个傍晚,她从杨家岭的窑洞跑到延河边打算洗一下旅程风尘。走下大半山坡时,她突然看到河边有一个人。曾克竟愣住了,这不就是阔别六年、杳无音信的柯仲平老师?在开封北仓中学,柯仲平向学生讲述的许多爱国思想、革命道理,在曾克年少的心灵里打下深刻的烙印。

柯仲平也认出曾克,他紧紧地抓住曾克的手。师生之间相互简单介绍了情况,当他知道曾克已成为一个青年文艺战士时,特别激动。他们缓缓走上山坡,柯仲平对曾克说:“现在我们可以高声歌唱了,我们要为劳动人民唱出最歌声。”

曾克初到延安,被安排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(简称文抗)工作。丁玲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(简称文协)副主任,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的。

曾克走进杨家岭的窑洞,还没抖掉满身尘土,一个身材不高女同志第一个来看她们。她八角军帽下露出短发,灰色棉军装上身扎着腰带,下身打着绑腿,同延安女同志一个模样。曾克没有想到,站在面前的就是她多年敬仰的丁玲,她惊呆了。

当年曾克在开封读书时,丁玲的《莎菲女士日记》《梦珂》等作品,就给了她启蒙和鼓舞。丁玲被逮捕失去自由时,曾克还为她担心流泪,在自己创办的《五只手》壁报上,发出过微弱的抗议和声援。

丁玲看着新来的人,眼光最后落在曾克的身上。生活经验丰富、反应敏锐的丁玲又从上到下看了曾克一遍,发现曾克怀孕了,靠近一些悄悄地说:“还不好意思啊!放心吧,延安的小米会把你和小宝宝养得红红胖胖的!”说完,又仔细询问她的身体、预产期等,临离开窑洞时还嘱咐她不要为怀孕背包袱,要抓住产前时间工作、学习,习惯新的生活。从此,曾克和丁玲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。后来,文抗搬到兰家坪,她们同住在一排窑洞,在一个党支部学习。

20世纪80年代,曾克撰文回忆当初见了丁玲时的情形,“她一直微笑着,笑得那么甜美,好像悄悄告诉我,在延安,生活是幸福如意的”。

1941年6月,曾克的大儿子出生。护士把婴儿刚一抱出来,文抗的党支部书记郑文和秘书长吴伯箫就代表组织前来祝贺。二人拿出30个鸡蛋、2斤红糖,并说:“这是胡乔木代表中宣部给你送来的,让你好好过日子。”寥寥几句话,曾克听起来重有千钧。这里饱含着党对文化战士的关怀,也是“母亲”对女儿的深情。

30个鸡蛋、2斤红糖,一份厚重的礼物。曾克知道,当时在延安,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让每天供应他们一个鸡蛋。曾克不肯收下这些,前来慰问的同志解释说:“这是毛主席的意思。”曾克不得不收下这份厚礼,她随即把鸡蛋和糖交给护士,劳其帮忙煮好分给其他产妇同吃,将“母亲”的温暖传递给更多人。



曾克早期作品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